

# 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前后社会主要矛盾 论断转变的原因分析

□ 冯务中 郭 玮

**[摘要]**中共八大决议认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这一论断,八大二次会议明确指出社会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的矛盾”、“两条道路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转变始终围绕“向自然界开战”与“阶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这两对范畴进行。前者转变的逻辑可能性是对“向自然界开战”与“阶级矛盾”关系认识的不清晰,现实可能性是对国内外一系列政治事件原因的判断;后者转变的逻辑可能性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与“阶级矛盾”三个范畴之间的模糊关系,现实可能性是对整风运动中“右派进攻”的严重估计。

**[关键词]**八届三中全会;社会主要矛盾;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3) 03-0048-05

**[作者简介]**冯务中,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郭玮,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 一、八届三中全会前后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转变

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闭幕会上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sup>[1]</sup> 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明

确改变了八大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sup>[2]</sup>。但这只是内部讨论,并未公开发表。直至195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这一论断才正式公开。这篇报告经过了毛泽东的审阅和修改,并在其主持下经过了周恩来、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的讨论,代表的是党中央的观点,而非个人观点。<sup>[3]</sup> 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收稿日期:2013-04-2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人民幸福’问题研究”(批准号:12BKS0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国民幸福问题”(项目批准号:09YJC710032)的阶段性成果。

• 48 •

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sup>[4]</sup>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变,转变的原因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 二、从“向自然界开战”与“阶级矛盾”的关系看社会主要矛盾论断转变的原因

1952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包含着两重任务:一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二是实现工业化。第一个方面主要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第二个方面主要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面临着如下两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如何正确把握这一现实的社会状况: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否业已构建完毕;它们是否还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它们是否还需要调整?二是如何确定今后工作的重心:是解放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是改造人与人的关系还是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是进行阶级斗争还是向自然界开战?确立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无疑就是要对上述问题予以回答。

从中共八大到八届三中全会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论述来看,党对以上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根据上文提到的中共八大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显然党中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建立,斗争焦点由解放生产力转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从阶级斗争过渡到向自然界斗争。而1956年12月所作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则明确指出,“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sup>[5]</sup>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将人民内部矛盾定位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sup>[6]</sup>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到了八届三中全会,主要矛盾完全由向自然界斗争转变为阶级斗争。

(一)转变的逻辑可能性:对“向自然界开战”与“阶级矛盾”关系认识的不清晰

在“向自然界斗争”和“阶级矛盾”关系的认识上,当时的领导人始终有两根相互缠绕的逻辑线索: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处理好这两类矛盾的基础上,

更好地向自然斗争,发展生产力。八大之前,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突破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上的局限性,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依然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适应,依然存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矛盾。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是从十个方面探讨如何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提高生产力创造前提条件。其中第四至第九部分所谈的内容就在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域内。<sup>[7]</sup>

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和中央领导人对其阐发中表明: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sup>[8]</sup>第二,这种基本矛盾在当今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在过去表现为敌我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也是如此。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过去是资本家、地主、富农占有生产资料,现在是人民占有生产资料)。”<sup>[9]</sup>第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为了调整生产关系,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向自然开战。“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sup>[10]</sup>

主要矛盾论断从向自然斗争转变为阶级斗争之后,党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依然没有改变。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向自然界斗争,而是当前阶级矛盾激化的现实要求必须先处理好阶级矛盾,才能为提高生产力扫除障碍。反右派斗争形势基本稳定后,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他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要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作用,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就必须发展生产力,在经济上摆脱束缚。“超英赶美”的口号也由此流行开来。<sup>[11]</sup>沿着这一思路,八大二次会议虽然确定了以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但其总路线却被确立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即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致可以从如上两者的相互关系中得到解释。

单从理论层面上看,当时党对这两者关系的认识似

乎十分清晰:阶级斗争是为了消解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为了更好地向自然斗争;但从现实层面来看,这两者之间孰重孰轻,该如何排序、取舍,当时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一方面,向自然斗争,发展生产力是根本目标,阶级斗争归位于向自然的斗争;但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却是解放生产力的必要前提,其顺序又似乎应当放在向自然斗争之前。这就为主要矛盾由向自然斗争转化为阶级斗争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在人与人的矛盾不突出时,向自然斗争,提高生产力作为根本目标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一旦人与人的矛盾(包括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激化,阶级斗争作为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则完全有可能成为关注的焦点。

党对向自然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这种认识只是为主要矛盾的转变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促成论断转变真正实现的还有党中央对国内外一系列政治事件背后原因的判断。

(二)转变的现实可能性:对国内外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原因判断

中共八大前后,我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都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动荡的现象,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些现象,组织专门的力量分析其背后的原因。通过分析,党中央将其归结于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是这一判断将主要矛盾论断由向自然斗争推向阶级斗争,将上文提到的逻辑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1956年6月波兰事件爆发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关于对“波兰事件”的处理。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毛泽东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后来又开会商讨此问题,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也于10月23日抵达莫斯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21日匈牙利事件爆发,在莫斯科访问的刘少奇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消息。波匈事件的爆发绷紧了毛泽东思想当中一直存在着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sup>[12]</sup>他专门组织人员写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基本矛盾在当今主要表现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匈牙利事件就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敌我矛盾的激化。

1956年下半年,国内生产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出现了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闹事的情况。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些问题。1957年,他以“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发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将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归结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矛盾”<sup>[13]</sup>,认为国内少数人闹事主要是因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刘少奇进一步将焦点由人民内部矛盾缩小到干群矛盾,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不关心基础,不为基础服务,反而伤害基础,就是官僚主义”,“新建立的生产关系巩固之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有什么矛盾呢?我想,这矛盾主要就表现在分配问题上”。<sup>[14]</sup>

### 三、从“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关系看社会主要矛盾论断转变的原因

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中央对波匈事件的原因判断有一个微妙的变化:从单纯的敌对阶级之间矛盾到敌对阶级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结束语中,将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归纳为“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sup>[15]</sup>,其中官僚主义被放在了第一位,而反革命分子的作用则被放在了最后。与此同时,党中央的注意力逐步转向国内,在分析少数人闹事问题上,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干群矛盾开始凸显出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之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杭州,途径天津、济南、南京等地,“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sup>[16]</sup>。4月19日,他指示,要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核心开始党内整风。

但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这种趋势发生了急剧逆转,阶级矛盾特别是“右派”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凸显出来。在1957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

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指示》中,“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被并列在一起提及,体现着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中的一部分即人民和“右派”的矛盾转变为敌对阶级之间矛盾的意蕴。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中,将资产阶级中的“右派”视为反革命,将其与人民的矛盾定性为敌我对抗性矛盾。“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sup>[17]</sup>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就指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敌对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sup>[18]</sup>文章虽然还讲“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与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sup>[19]</sup>,但其焦点却从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官僚主义,变为敌我矛盾中的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sup>[20]</sup>沿着这一思路,八届三中全会将主要矛盾转移到了阶级矛盾上。

这一急剧的转向有着理论和现实双重原因。与上文从向自然斗争到阶级斗争的变化机制相同,都是理论上的模糊给论断转变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对现实形势变化的认识将这种可能变为了现实。

(一) 转变的逻辑可能性 “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与“阶级矛盾”三个范畴之间的模糊关系

中共八大前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一对概念被凸显出来,但它们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却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到底谁涵盖谁;如不能涵盖它们相互交叉的部分又是什么;它们之间能否相互转化;转化的条件又是什么。在现实中,它们的外延包括哪些矛盾,这些具体表现中谁又是最主要的?这一系列问题在当时领导人的表述中是含糊而多变的。

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敌我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等于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即非对抗性的矛盾,就是指阶级内部的矛盾。此文虽未指明这两种矛盾之间谁为主,但却提到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

的利益”。而且,“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sup>[21]</sup>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这些表述发生了如下变化:第一,工人和民族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sup>[22]</sup>第二,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sup>[23]</sup>第三,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在经济上基本被消灭,转而突出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且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总体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sup>[24]</sup>第四,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表现在官僚主义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在过去表现为敌我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也是如此。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过去是资本家、地主、富农占有生产资料,现在是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不关心基础,不为基础服务,反而伤害基础,就是官僚主义。”<sup>[25]</sup>

1957年5月15日前后,整风运动开始转向反右,党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首先,阶级矛盾从人民内部矛盾划归到了敌我对抗性矛盾;其次,人民和“资

产阶级右派”之间的矛盾代替干群矛盾成为焦点。

由此可见,在整风形势变化之前,阶级矛盾的观念在毛泽东等领导人思想里就一直存在着;而在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关系中,始终有从人民内部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的逻辑可能性。转化的具体机制有两个:第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区别的理论基础是“人民”和“敌人”这两个概念,而这两个概念是历史的、相对的,其划分的标准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变化;<sup>[26]</sup>而“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划分标准则是相对确定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不同地位。一个外延是变化的,而另一个则是相对确定的,因此阶级矛盾与这二者的关系就不是壁垒分明、固定不变的:阶级矛盾属于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是有条件的,条件变化之后,就有可能发展为敌我对抗性矛盾。第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经济层面上的阶级矛盾不再大规模、长期存在,但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的阶级矛盾却是长期存在的,并有可能由于政治形势和人们思想状况的变化而普遍化、严重化。

(二)转变的现实可能性:对整风运动中右派进攻的严重估计

整风运动初期,矛头主要指向官僚主义。但1957年5月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进入高潮后,形势发生了变化。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会议期间,一些与会代表逐渐将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章伯钧在发言中提出了“党党相护”;一些高校代表提出要取消党委制。<sup>[27]</sup>

这些言论被视为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立刻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他对此形势作出严重估计,并迅速作出反应,开始组织反右。5月14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鸣放问题。当天,在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报导当前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中提出要对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原样报道出来,以进一步暴露右派的反动面目。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最初命名为《走向反面》)对左、中、右派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严厉批评右派的猖狂进攻。此后,毛泽东对整风运动走向的判断发生了根本变化,“根据这个精神,从5月中旬至6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

斗争的策略”<sup>[28]</sup>。此时中央对右派的言论并未从正面公开进行批驳,而是要让其继续“大鸣大放”以暴露得更为彻底和充分。直至5月25日毛泽东接见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时,“反右”意图突破了党高层领导的范围,向全社会公开。这之后,党对“反右”进行了一系列部署。<sup>[29]</sup>随着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整风运动形势判断发生变化,主要矛盾的论断也最终实现了从人民内部矛盾到阶级矛盾的转化。

总体来看,从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经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再到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改变,始终纠缠在“阶级斗争”与“向自然界斗争”、“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对关系之中。前一对关系的视域在于如何同时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平衡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安定的关系;后一对关系的视域则在于如何判定人与人的关系中何种类型的矛盾可以被判定为阶级矛盾,它们是否会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阶级矛盾和对抗性矛盾。而对这些基本问题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是导致后来社会主要矛盾论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注释:

[1][5][21]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9):341-342,571,563.

[2][8][9][10][14][17][18][19][20][22][23][24][25]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0):593,71,251,74,251,289,484,485,486-487,63,63,125,251.

[3]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的决策和回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23-635.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717-722.

[4]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1):288.

[6][11][12][15][16][27]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20,761,606-607,607,663,685-689.

[7][13][26]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28-40,211,205.

[28][29]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的决策和回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13,616-617.

责任编辑:李海峰